

“学者鲁迅”的生成：日本汉学界对《中国小说史略》的学术使用

西南学院大学 国际文化研究科

崔子哢

[摘要] 既有鲁迅在日传播研究多关注其小说译介、文学评价与思想接受,较少追问其学术著作如何进入日本汉学界的知识生产过程。本文聚焦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日本汉学界对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学术使用,通过考察日本汉学家对《中国小说史略》的早期评介、具体征引及其在不同研究领域中的实际使用方式,分析《史略》如何由资料性参考逐步转化为可资判断的学术资源,并据此说明相较于当时尚处于零星译介阶段的“文学家鲁迅”,“学者鲁迅”形象在日本汉学界更早获得了明确可见性。研究认为,仓石武四郎、盐谷温等日本汉学家通过评介、征引、补正等方式,将《中国小说史略》纳入小说史、目录学、版本学、术语辨析及跨文化文学论述等具体研究实践之中,使其逐渐成为文献定位、版本判断与文学价值评定的重要学术依据。与此同时,鲁迅也由《中国小说史略》的作者,逐步被认识为能够提供文献依据、学术判断与解释框架的“学者”。由此可见,鲁迅在日本的早期形象并非仅由文学译介塑造,也是在汉学界的文献使用、知识分类和学术评价过程中逐步生成的。而所谓“学术使用优先”路径,不仅体现了日本汉学面对鲁迅时的知识选择机制,也为理解鲁迅形象在跨文化传播中的生成方式提供了新的切入点。

[关键词] 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 学者形象 日本汉学 知识选择机制 跨文化传播

引言

鲁迅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长期以来是中日鲁迅研究的重要课题。近年来,中日学界围绕鲁迅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日本的传播、译介与接受,已形成较为丰富的研究积累。相关成果主要集中于以下方面:首先,以史料发掘与整理为主,侧重梳理当时日本对鲁迅的介绍、评论及相关论述^[1]。其次,以译介史为线索,追踪鲁迅新文学作品在日本的翻译、刊载及其传播形态^[2]。在史料发掘整理与译介过程考察方面,戈宝权、丸山升、靳丛林、冉秀等学者都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论述^[3]。再次,在史料整理和译介过程考察的基础上,部分研究进一步将译者与传播者置于知识网络和社会语境之中,分析其身份背景、译介动因及传播机制。例如,乐融(2014)对清水安三推崇鲁迅的原因、藤泽太郎(2018)对镰田政国翻译《白光》《孔乙己》的动机、铃木将久(2020)对井上红梅翻译《狂人日记》的情形,以及冉秀(2021)对神谷衡平将鲁迅文学作品编入日本教科书的情况,均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总体来看,既有研究大多以“文学家鲁迅”为中心展开论述,重点考察其文学作品在日本的早期接受过程,并据此勾勒出鲁迅以“文学家”身份进入日本的基本路径与讨论框架。与此相比,对于鲁迅学术著作在日本的传播路径、使用场域及其与“学者鲁迅”形象生成之间关系的研究仍显不足,尚缺乏系统梳理。

[收稿日期]2025-10-15

[作者信息]崔子哢,男,西南学院大学国际文化研究科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文学在日本的传播,电子邮箱:cuizixian19970719@163.com。

基于这一认识,本文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日本汉学界对鲁迅代表性学术著作《中国小说史略》(以下简称《史略》)的使用为中心,考察该书进入日本汉学研究实践的早期过程以及该时期“学者鲁迅”形象的生成。选择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作为考察时段,主要基于以下考虑。

首先,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不仅是《史略》成书与出版的时期,也是其开始进入日本汉学界并被纳入学术使用的重要起步阶段。《史略》是中国小说史研究中具有奠基意义的著作,也是鲁迅最具代表性的学术著作之一。该书于1923年、1924年由北京大学新潮社分上下册出版,1925年由北新书局合印一册,正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完成了从讲义到正式著作的出版过程。与此同时,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日本汉学界使用《史略》的相关史料较为丰富,在论文、书评及相关研究论述中对《史略》的征引和参照并不少见,其中既包括专业性评介,也包括在中国小说史叙述、目录版本考证和文献判断中的具体使用,足以支撑对其早期学术使用情况的具体考察。增田涉(1935:5)后来亦指出:“试观近来有关中国小说研究的文献,几乎所有论著都会援引此书的记述,称‘鲁迅氏的《小说史略》中云云’。”值得注意的是,自1925年北新书局合印本刊行至增田涉作出上述论述,前后不过十年。在如此有限的时间内,《史略》已被描述为中国小说研究中几乎不可回避的参照文献,足见其学术地位确立之迅速。从现存材料来看,《史略》的出版、早期评介与最初征引均发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其在本国汉学研究中的具体学术使用也已于这一时期陆续出现。因此有必要回到这一时期,考察《史略》进入日本汉学界研究实践的初始状态,进而分析其学术位置逐步形成的过程。

其次,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也是“文学家鲁迅”形象在日本尚未充分定型的早期阶段。此时,鲁迅文学作品虽已开始被介绍和翻译,但相关传播多依附于个别译者、杂志和单篇文本,对《呐喊》《彷徨》等作品集的系统译介和讨论还未充分展开,后世以“文学家鲁迅”为中心的接受格局尚未形成^[4]。与此相对,《史略》已经开始进入日本汉学界的专业研究脉络,并在相关论述中被征引、参照和吸收。因而,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为中心考察《史略》的学术使用,有助于在后世“文学家鲁迅”形象尚未充分覆盖早期接受现场的阶段,较为清楚地把握鲁迅作为学术著作作者进入日本汉学界的过程,并进一步观察“学者鲁迅”形象的生成。

综上所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既是《史略》成书、出版并开始进入日本汉学界研究实践的时期,也是“文学家鲁迅”形象在日本尚未定型的早期阶段,这为考察“学者鲁迅”形象的构建留下了足够的讨论空间与相对清晰的历史现场。下文将从《史略》的早期评介、具体征引及其在不同研究领域中的实际运用等层面展开讨论。通过这一考察,本文将说明《史略》如何逐步转化为日本汉学界可资援引的学术资源,鲁迅又如何由该书作者进一步被认识为能够提供文献依据与学术判断的学者。由此,“学者鲁迅”形象何以在日本相对较早生成,以及鲁迅在日本早期获得可见性的具体路径及其背后的知识选择逻辑,也将得到进一步揭示。

1 《史略》在日本汉学界的早期评介与初始定位

考察《史略》在日本的早期传播与使用,可以先从其最初被评介的情形切入。1925年北新书局合印版刊行后,《史略》很快引起仓石武四郎、盐谷温、长泽规矩也、内田泉之助等日本学者的注意,并被征引为多篇汉学研究论文的重要参考文献。其中,仓石武四郎是最早系统评介《史略》的日本汉学家。他不仅认识到《史略》在小说史料整理方面的工具性价值,也注意到其断代框架与书目体系所具有的学术意义。1926年8月,仓石以“卧云”为笔名,在《支那学》“新刊介绍”栏目中对《史略》进行了评介,并注明所据为1925年北新书局出版的合印版本,这篇文章可视为日本本土最早评介《史略》的文章。仓石武四郎(1926:130)对《史略》的成书过程亦有相当了解:“有关鲁迅先生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并讲授《中国小说史》的消息,笔者早已从报章杂志等处屡屡听闻。本文所介绍的《史略》一书,正是他该课程讲义的主要内容汇编。”^[5]彼时,日本汉学界对中国小说与戏曲的研究已初步形成体系。《史略》作为一部新刊行的小说史著作能够在“授课时期”便进入日本

汉学界的视野,表明其在当时已被视为具有较高学术参照价值的重要文本。由此看,仓石的评介并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新刊介绍”,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承担了将《史略》引入日本汉学界专业讨论视野的作用。

仓石对《史略》的评介包括以下内容:

首先,仓石对鲁迅作了简要介绍:任职于北京大学,是著有《狂人日记》《阿Q正传》、深受文学青年欢迎的作家,也是中国新文艺的急先锋。值得注意的是,仓石虽然提及了鲁迅的“文学家”身份,但并未进一步展开。随后,仓石以较大篇幅集中评介《史略》。他指出,《史略》在目录学层面“远远超越了以往的小说史著作”。其依据在于,《史略》在卷首设置了“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一章,从“纯客观”的立场对小说在学术史上的位置作出概括,并预先提示全书的基本方针与总体框架。在此基础上,鲁迅又按照六朝志怪、唐代传奇、宋代话本、元明讲史、明代神魔小说与人情小说、清代讽刺小说、人情小说、侠义小说、谴责小说等不同类型,对各时代的重要作品加以列举与整理。仓石认为,这种分类得当,能够清晰地呈现中国小说的发展脉络。此外,他还特别肯定《史略》中对六朝小说材料的处理,认为鲁迅“善于重拾旧书”,发掘出许多以往被忽视的材料;在近世小说部分,鲁迅又对作者及成书年代作出周密考订,仓石认为这些工作都为此后研究提供了切实的便利。可见,在仓石的评介中,鲁迅虽以文学家的身份被简要介绍,但真正进入仓石视野的却是鲁迅作为学者体现出来的学术能力以及《史略》所体现出的学术价值。

其次,仓石对《史略》中若干依据珍本所作的判断持保留意见。他提醒说,基于珍稀版本展开的研究,往往容易对材料价值作出过高估计。同时,他对于将《四游记》视为现行《西游记》原本、《水浒传》英雄谱本先于百回本等观点,亦持审慎态度。不过,仓石同时又指出,姑且不论这些具体判断的得失,《史略》在资料层面对中国小说所作的系统整理,仍是无可否认的成就。由此可见,仓石对《史略》的评介并非单纯肯定,而是肯定与批评并存,但总体而言,肯定仍占主导。所谓“批评”,更多体现为对学术方法细节上的温和提醒,如对“珍稀版本”使用倾向的警觉;而“肯定”则体现在对鲁迅系统性整理文献、发掘冷僻材料、确立近代小说史框架等方面的高度评价。就总体倾向而言,仓石对《史略》的评介虽有保留,其核心判断仍是积极的。这种评介方式本身即表明,《史略》已经被日本汉学界视为可以讨论、检验和补正的学术对象。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鲁迅已不只是作为《史略》的作者被提及,而是开始作为能够提出学术判断、同时也可被学界回应和商榷的学者进入日本汉学界视野。

再次,仓石亦对《史略》文风与审美特质提出意见。他认为,该书略带“白墨气”(即教学讲义式的干涩),鲁迅独有的“才情所发出的香气”反而被讲义体制所掩盖,谓其“课堂上的讲义更具神采,而今所见仅为其骨架”,此评价显露出仓石对文本风格之不尽人意的惋惜。在此语境下,“香气”首先指向的是鲁迅作为文学创作者所具有的文采与个性。仓石显然期待,即便是在《史略》这样一部学术著作中,也能够多少见到《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作品所具有的语言魅力与表现张力。因而,其所感受到的“白墨气”与“香气”之间的落差,实际上表明其在阅读《史略》时,仓石已经将鲁迅的学术著述与文学创作并置起来理解。仓石对“白墨气”与“香气”的区分,也折射出仓石面对鲁迅时对于“学者”与“文学家”两种身份的区分意识。作为小说家与新文艺先锋的鲁迅,已通过《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作品呈现出鲜明的语言个性与精神气质,因此当《史略》以讲义汇编的形式呈现时,仓石所感受到的“干涩”与“骨架感”,实际上正来自其学术文体与既有文学印象之间的落差。他所惋惜的并不只是《史略》在表达层面不够生动,更在于这部著作未能充分显露出他所期待的、属于“文学家鲁迅”的才情与风采。由此可见,至少在仓石这里,鲁迅并非以单一的“文学家”或“学者”形象出现,而是在两种身份的交错中被理解。“学者鲁迅”形象的生成,并不是以“文学家鲁迅”的消失为前提,而是在后者尚未充分定型、前者逐渐获得学术可见性的过程中开始显现出相对清晰的边界。

最后,仓石甚至关注到了《史略》在日本被“盗版”的情况:“《史略》出版不久,东京方面即推出一部题为《中国小说戏曲史概说》^⑥的著作,虽在序言中自称为‘短期成书’,但通读其小说部分内容,不难发现其多有

与鲁迅著作暗合之处,结构与论述方式甚至近乎照搬。尤为讽刺的是,该书竟被东京的某历史学术期刊加以推介,冠以‘学术新创作’之名。”仓石的这一批评表明,《史略》在日本所产生的作用,已不只停留在公开评介、征引与讨论层面,也表现为其论述框架与知识成果被他者吸收、改写乃至重新包装。这一现象固然涉及“独立研究”与“学术伦理”之间的界限问题,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史略》作为学术资源在日本汉学界的学术作用。也就是说,正因为《史略》已经提供了被日本汉学界认可的较为完整的小说史叙述框架、材料组织方式与文献判断依据,它才可能被迅速吸收和转用。一方面,这种“拿来式接受”表明,《史略》所提供的论述框架与知识成果,已经被日本学界吸纳为具有实际效用的学术资源;另一方面,它也揭示出,在这一“接受”过程中,鲁迅作为原作者的贡献有时会被遮蔽,不能在表层论述中得到充分标示。

总之,仓石武四郎对《史略》的评介,其意义不仅在于出现时间较早,更在于初步确立了日本汉学界理解和定位这部著作的基本方式。仓石并未将《史略》仅仅视为一部来自中国的新刊,而是将其置于日本既有的中国小说研究脉络之中加以衡量。这意味着,《史略》在进入日本汉学界之初,便不是作为“异域新知”被一般性地介绍,而是作为可供检验与评议的学术著作进入讨论视野。在此基础上,仓石的评介表现出鲜明的专业性:他一方面对《史略》的目录学体例、材料整理及断代意识给予高度肯定,另一方面也对其珍本利用及文风表现保留了审慎意见。正是这种建立在目录、版本与史识基础上的评价方式,表明《史略》已较早进入日本汉学界的学术判断体系。更值得注意的是,从其后围绕《史略》展开的补正、吸收乃至挪用等现象来看,《史略》在日本所引发的已不只是阅读层面的反应,而是开始进入当时中国小说史研究的具体论述过程。就此而言,仓石的评介不仅是日本学界较早理解和定位《史略》的重要文字,也构成了“学者鲁迅”在日本汉学界获得初步确认的重要起点。若进一步考察《史略》在日本汉学界的具体使用情形,便可更清楚地看到,它如何在不同研究场景中被征引、参照,并逐渐转化为具有实际效力的学术资源。

2 文献定位与目录互补:《史略》在日本的资料性使用

《史略》在进入日本汉学界视野后,迅速被纳入小说史、目录学与版本考证等具体研究之中。《史略》之所以能够较快转化为实际研究资源,一方面在于彼时日本汉学者普遍具备阅读中文原典的能力,且形成了以汉文训读与文献考证为基础的研究习惯,因此《史略》无需经过翻译、转述等中介环节,便可直接进入研究者的阅读、征引与讨论之中;另一方面,则在于《史略》在文献分类、书目断代及版本辨析等方面所提供的资料与判断,恰与日本汉学界在小说文献整理与考证研究方面的现实需求相契合。正因如此,《史略》在日本的早期传播,主要体现为其迅速成为日本汉学界研究中国小说的学术“工具书”。

首先,作为一部文学史著作,《史略》的学术价值不仅在于其对中国小说发展脉络的系统梳理,更在于其对相关文献成书年代的重新考订,为日本汉学者提供了较为清晰的历史坐标与断代依据。例如,武藏大学教授内田泉之助(1927:47)在《长恨歌的展开》中提出,“长期以来被视为唐代作品的《杨太真外传》,实则更接近于宋代在《长恨歌传》《津阳门诗》等先行文本基础上的文学性改编与再构,因此将该作归入宋代作品更为合理。”这一判断本身并不只是对单一作品时代归属的辨析,也关系到相关文本在唐宋文学演变过程中的位置及其文学史意义的重新界定。内田的论证虽建立在文本比较与文献整理的基础之上,但其论证的关键支点之一,正是鲁迅(2005:107)在《史略》中关于“《杨太真外传》二卷,即宋乐史之撰也”的判断。可以看出,内田并非只是将鲁迅的说法作为一般性的参考意见附带征引,而是将其直接纳入作品断代问题的分析结构之中,使之成为支撑其论证的重要依据。鲁迅所提供的已不只是材料线索,而是能够参与断代判断并影响文学史定位的学术意见。《史略》在具体论证中承担了支撑断代判断与文学史定位的功能,由此对日本学者相关文学史判断的形成产生了实际影响。

其次,《史略》所具有的文献定位与资料互证功能,也使其成为日本汉学者确认文献线索、补充藏本信息的重要依据。以仓石武四郎(1927:134)为例,他在《在介绍〈目连变文〉之后》一文中指出:“另读鲁迅的《史略》第二十篇,得知京师图书馆藏有《目连入地狱故事》这一敦煌之物”,由此借助鲁迅的记载来确认文献的收藏线索。在《史略》介绍文中,他又提到:“鲁迅似尚未知晓明代《喻世明言》存世之状”,并据此引入日本内阁文库所藏之相关版本,以补充《史略》论述中尚未涉及的材料。这种补充并不是对鲁迅判断的简单否定,而是在承认《史略》已提供基本问题意识与文献坐标的前提下,进一步结合日本所藏资料加以修正和扩展。此类“补中日之未备”的学术行为,显示出《史略》已经进入文献考索与资料互证的实际研究过程,成为日本学界进行版本鉴定与史料补遗的重要参照。

更进一步,鲁迅所建构的小说史框架也成为日本学者论证结构中的重要起点。例如,盐谷温(1926)在《斯文》杂志发表的《关于明代小说〈三言〉(二)》一文中,多次引用《史略》中关于“二言尚未见到”(鲁迅,2005:204)的表述,既将其作为论述展开的出发点,又围绕鲁迅的判断对中日两国“三言”存世情况进行系统增补与细致修正。这种文本引用已非单纯资料征引,而是被纳入日本汉学者自身的论证结构之中,表明《史略》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日本汉学界自身知识结构的构建。这一现象不仅体现出日本汉学者对中国古典小说版本研究的深厚积累,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史略》在日本汉学界所激发的实证性回应与再研究动力。可见,《史略》已经不只是为研究者提供若干零散材料,而是进一步成为组织问题、展开讨论并推进论证的重要依据。需要指出的是,鲁迅在编写该书时主要依赖当时中国境内可得文献资源,难免存在史料覆盖不全之处。然而,正因其敏锐的问题意识与富有结构感的史学视角,《史略》反而为日本汉学界重新梳理资料体系、开展学术对话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启发。

在探讨《史略》作为资料性文献的重要作用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某些文献在日本学者的研究中被判定为“稀见”或“具有研究价值”,与其在《史略》中被鲁迅点名提及这一目录学线索相关。1926年10月,《斯文》刊载长泽规矩也^[7]所撰《传奇四十种与小说三十种》一文,即为典型一例。文中提到:“在鲁迅的《史略》中,也曾提及‘墨憨斋传奇定本十种’(鲁迅,2005:205),其目录可见于梁廷枏《曲话》卷三,但没想到这些版本的实物竟然在日本也有收藏,实在令人耳目一新”(长泽规矩也,1926:493)。这一论述表明,鲁迅的提及并不只是作为背景知识出现,而是参与了长泽对相关版本价值的判断,使长泽得以更清晰地把握现有文献的学术意义。由此看来,鲁迅在《史略》中的相关判断,已在具体研究中发挥出识别版本价值的作用,并为日本汉学者理解日本所藏相关文献的学术意义提供了可依凭的判断依据。

值得一提的是,上文所述《斯文》杂志,系“斯文会”^[8]的机关刊物。《斯文》不仅延续了斯文会一贯重视传统汉学的研究取向,同时也逐步将关注范围拓展至中国近代学术思想的演进,并开始持续关注鲁迅及其相关著述^[9]。这表明,《斯文》对鲁迅的关注已不再停留于一般性的动态介绍,而是开始将其相关著述纳入日本汉学界可供持续追踪与理解的对象之中。随着《史略》及相关著述不断被介绍、转载与讨论,鲁迅的学术活动也逐渐进入日本汉学界较为稳定的观察视野。由此,围绕鲁迅的传播遂呈现出由动态介绍、文献追踪进一步转向学术引介的发展趋向。

简言之,无论是内田泉之助借助鲁迅之说重新审视《杨太真外传》的成书年代,还是仓石武四郎、盐谷温、长泽规矩也等人围绕藏本、版本及流传情况所作的补充、修正与辨析,都表明《史略》在日本所发挥的作用,已不止于提供材料线索,而是逐渐成为确认文献价值、组织研究问题并推进具体论证的重要依据。正是在这种持续的征引、参照与扩展过程中,鲁迅在《史略》中提出的相关判断,逐渐超出原著文本本身的范围,开始在日本学界获得更为实际的学术效力,鲁迅本人也不再仅仅被视为《史略》的作者,而逐步被认识为能够提供文献依据与学术判断的学者。就此而言,《史略》在日本汉学界的意义,不仅在于其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整理框架,更在于它使鲁迅较早进入日本学界可资信赖与依凭的学术视野,并为《史略》进一步

进入作品评价、术语辨析与文学史建构等更深层次的论述空间奠定了基础。

3 史实辨析与史论建构:《史略》在日本的批评性使用

《史略》的作用并不止于目录学、版本学与文献考证层面的资料性功能。随着其相关判断不断被征引、转用与展开,《史略》还进一步进入作品评价、术语辨析及文学史论述等层面。例如,荒野悌三郎(1924)在《关于翻译〈觉后禅〉》^[10]一文中对出版社优先出版池田桃川翻译的《觉后禅》进行批评时,特意引用《史略》中对《肉蒲团》“较为出类而已”(鲁迅,2005:190)的评价,以强调该书虽略胜于一般艳情小说,但终归为“淫书”之列,不宜列为译介中国代表性文学的优先之选。在荒野的批评话语中,鲁迅的文学史判断不只是一般参考意见,而是成为其论证“何种作品值得优先译介”的依据。

又如,米田祐太郎(1927:37)在《支那近代小说考》中论述《金瓶梅》时,援引了鲁迅对该书的评析:“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认为,‘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鲁迅,2005:187)。”鲁迅对《金瓶梅》的评述不仅为米田祐太郎(1927)关于“《金瓶梅》并非只是情色小说,也应被视为写实型小说”的观点提供了有力佐证,也进一步强化了《金瓶梅》在日本汉学界的学术地位。上述两例表明,《史略》在日本学界所发挥的作用,已不再停留于资料引述与文献参照的层面,而是进一步进入作品评价与文学史论述之中。鲁迅在《史略》中作出的相关判断,也由此逐渐转化为日本学者理解作品性质、确认其文学史位置的重要依据。

此外,《史略》还被用于术语辨析与跨领域文学史论述等层面。此时,《史略》所提供的已不只是关于中国小说史的专门知识,而是能够为不同研究领域所调用的解释资源与判断框架。具体而言,这种学术使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在训诂与术语辨析方面,《史略》为现代语境中的文学术语提供历史依据与解释权威。例如,木村毅^[11](1928)在《拟森鸥外致永井荷风书》中,模仿森鸥外的语气对永井荷风进行了批评。木村指出,永井荷风在《小说作法》中所说的“小说一词起于张衡《西京赋》‘小说九百,本自虞初’”,尽管参考了鹭津毅堂的观点,但仍属于“考证尚未深入的幼稚时期”的早期考据成果,依据并不充分。随即,木村引用鲁迅《史略》中“小说之名,昔者见于庄周之云‘饰小说以干县令’”(鲁迅,2005:6)的论述,在史实层面明确了“小说”一词可追溯至《庄子》而非《西京赋》;同时又进一步引用鲁迅的观点“与所谓小说者固不同”(鲁迅,2005:6),强调“小说”一词古义与今义之间的语义断裂,由此指出“小说”作为文学术语在语义与文类结构上经历了近代转型。木村凭借鲁迅在《史略》中的考据与辨析,对永井荷风的“小说起源论”提出质疑:若承认庄子所言“小说”与今义不同,那么为何又执意主张“小说起于张衡”?并进而质疑永井荷风作为“考证家”的学术资格。在这一论证中,鲁迅在《史略》中所做的训诂性判断,因其对古籍文献的精准辨析与对词义演变的系统梳理,在相关研究中被赋予了相当的权威性。这种建立在训诂与考据基础上的判断,不仅增强了相关文学术语解释的历史层次,也显示出《史略》已开始在日本文学界承担更具权威性的概念界定功能。

其二,在古典小说与文化传播研究中,《史略》作为提供背景知识与作者资料的基本文献,成为日本学者论证中国文化影响路径的重要依据。例如,土田杏村^[12](1928)在《万叶时代文学与美术的理念》一文中,分析了奈良时代文学受到唐代作品影响的可能性,认为柿本人麻吕的《别妻歌》在结构与情感处理上,与张鷟所作《游仙窟》之间存在联系。在对张鷟其人及其创作背景进行论述时,土田主要依托鲁迅在《史略》中的考证成果展开分析。例如“鲁迅根据《唐书》中的记载考证出他的生卒年大约在公元660年到740年之间”以及“鲁迅考证认为,张文成创作这部小说应是在他年轻时期”等。在将张鷟的《游仙窟》与柿本人麻吕《别妻歌》进行比较研究时,土田亦明确指出:“关于张文成的部分参考鲁迅《史略》的内容较多”。由此可见,土田并非

仅仅将《史略》作为人物资料的来源,而是将鲁迅的考证成果纳入其关于中日古代文学关联的整体论述之中。在这一论证结构中,鲁迅关于张鹞及《游仙窟》的判断,成为土田展开跨文化文学比较的知识前提。《史略》由此不再局限于中国小说史研究内部,而是进一步进入古代文学、比较文学与文化传播论述之中。这说明,鲁迅在《史略》中所提供的,不只是中国小说文献的资料与判断,也成为日本学者理解中日文学关联、组织跨文化论述的重要资源。从这一点看,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史略》在日本的学术使用,已不再局限于传统汉学研究中的文献考证层面,而是开始延伸至中日文学关系与文化传播问题的讨论之中。

甚至,《史略》还进一步引发了围绕相关具体文献而展开的公开讨论与辩证。例如,德富苏峰(1926)曾在《国民新闻》发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一文,围绕《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及《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版本与时代问题,对鲁迅在《史略》中的相关论述提出勘误。与前述诸例主要体现《史略》在目录学、版本学、文学批评等不同场域中的学术使用不同,《史略》已进一步成为中日知识分子之间公开论辩的对象。其后,鲁迅撰写《关于〈三藏取经记〉等》一文予以回应,不仅译录德富苏峰原文,还就纸墨字体、宋讳缺笔、罗振玉题跋等证据逐一加以辨析。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在回应中并未将争论停留于“此书究竟为宋刻还是元人所撰”这一结论层面,而是进一步将问题提升为“版本考定应建立在何种证据基础之上”的方法论讨论。德富苏峰虽力图证明《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等为宋槧,但鲁迅则通过重申自己原文所言仅为“疑”而非“轻轻地断定”,并对“缺笔即可定代”及“题跋足以为据”等判断方式提出质疑,从而重新掌握了论辩的主动权。这场讨论的意义并不只在于某一版本结论之是非,更在于它显示出鲁迅在面对日本知识界公开质疑时,已能够凭借明确的问题意识、审慎的考辨态度与扎实的论证能力展开回应。就此而言,“学者鲁迅”的形象,并非仅仅通过日本学界对《史略》的征引而生成,也是在这种跨国知识交涉与公开论辩中被进一步确认和强化的。

综上所述,《史略》在日本学界的早期使用,已不再停留于文献资料征引与版本信息参照的层面,而是进一步进入作品评价、术语辨析、古代文学论述乃至公开学术论辩之中。鲁迅在《史略》中提出的相关判断,被日本学者不断纳入具体论述结构,并逐渐转化为理解作品性质、确认其文学史位置、组织研究问题与推进学术论证的重要依据。与此同时,日本学者从《史略》中吸收的,也并非仅限于对个别作品的具体结论,还包括鲁迅观察中国小说演变时所体现出的历史分期意识、叙述方式及整体判断框架。由此,《史略》在日本所发挥的作用,已由资料性参照转变为判断性影响,并进一步参与了日本学界对中国小说史的再认知与再建构。也正是在这一持续的征引、转用与论辩过程中,鲁迅不再仅仅作为《史略》的作者被提及,而是逐渐以能够提供文献依据、文学史认识与学术判断的学者形象,被较为稳定地纳入日本学界的理解与评价之中。“学者鲁迅”的形象亦由此获得了更为清晰的轮廓。

4 从《史略》的学术使用到“学者鲁迅”的先成其形

综观前文,《史略》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日本汉学界的早期传播与学术使用,并不只是中国小说史著作在日本的流布过程,更是“学者鲁迅”形象生成的重要路径。相较于当时尚未充分定型的“文学家鲁迅”形象,“学者鲁迅”在日本汉学界更早获得了较为明确的可见性。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史略》自身的知识形态与日本汉学界的研究需求密切相关。相较于鲁迅文学作品需要经过翻译、刊载、评论和读者接受等环节才能逐步形成较为稳定的文学接受格局,《史略》作为中国小说史研究著作,具有文献整理、小说史叙述、目录考辨、版本判断和术语辨析等多重功能,能够较为直接地进入日本汉学界既有的专业研究程序。无论是仓石武四郎对其学术价值的评介,还是内田泉之助、盐谷温、长泽规矩也、木村毅、土田杏村等学者在相关论述中的征引与运用,都表明《史略》在日本汉学界并非仅仅作为一部外来著作被介绍,而是被转化为可供援引、参照和判断的学术资源。正是这种与日本汉学界知识生产方式之间的高度契合,

使鲁迅较早以《史略》作者的身份获得了明确的学术可见性,也构成了“学者鲁迅”形象生成的重要起点。

其次,当时日本汉学界对“文学家鲁迅”的重视程度不够。相比于《故乡》等作品的文学价值,日本汉学界更重视《史略》的学术价值。不过,“学者鲁迅”的雏形早现并不意味着“文学家鲁迅”完全隐而不彰。事实上,同时期日本汉学界对鲁迅文学创作并非全然无视。无论是上文仓石武四郎所谓“才情所发出的香气”,还是目加田诚对《呐喊》《彷徨》的评述,均可视为当时日本汉学界对鲁迅文学素养所作出的肯定性回应。只是,在当时的专业研究语境中,鲁迅的文学身份尚未稳定地成为讨论中心。以目加田诚^[1]为例,他在大学四年级时参与东京大学中国哲文研究发表会,发表题为《现代中国文学界与鲁迅》的报告,对民国文学革命以后中国文学界的发展趋势、鲁迅的地位及其略历进行了论述,并尝试对《呐喊》《彷徨》两部小说集作出评价,认为即便鲁迅彼时似已陷入某种创作上的停滞,其作品仍具有相当高的艺术价值(目加田诚,1929)。值得注意的是,在同场四位发表者之中,唯有目加田诚一人将视线投向“中国现代文学”,其余三人所讨论的仍是“文中子”“魏三曹”“《礼记》”等传统汉学研究对象。这一差异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当时以传统汉学为中心的研究圈层并非完全拒斥现代文学议题,甚至已开始显现出向现代文学领域有限延伸的可能。不过,从目加田诚此后的学术轨迹来看,这种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关注并未得到延续,毋宁说更接近其求学阶段一次偶发性的接触。其毕业后先后担任九州大学教授、早稻田大学教授,并曾任日本中国学会理事长,逐步确立起其在本国汉学研究界的重要地位,但其主要研究对象始终集中于《文心雕龙》《诗经》《红楼梦》等传统汉学领域。仓石的情形亦大体如此。尽管他对鲁迅的文学才情有所意识,但在正式学术论述中,对鲁迅文学作品仅略有涉及,其讨论重心始终集中于《史略》的书目结构与历史体系。由此可见,日本汉学界并非完全没有注意到鲁迅的文学才能,但真正能够被持续征引、讨论并转化为学术资源的,主要仍是《史略》所呈现出的学术价值。

进一步说,日本汉学界面对鲁迅时所表现出的,并非单纯的“未知”或“忽略”,而是一种基于自身知识结构和研究需求的选择性吸纳。鲁迅文学并非全然未被注意,但即便进入教学、阅读与局部评论视野,也往往仍受制于研究者既有的学术训练和问题意识,未能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日本汉学界转化为持续而系统的专业研究对象。相较之下,《史略》所呈现出的文献性、体系性与可考证性,更容易被日本传统汉学研究的知识运作方式所吸收。它既可以服务于中国小说史叙述,也可以进入目录版本、文献考证和术语辨析等具体研究环节,因而能够较快被纳入日本汉学界的论述结构之中。正是在这种选择性吸纳与持续使用的过程中,鲁迅作为《史略》作者的学术身份获得了较为明确的确认,而其作为现代文学作家的一面,则未能在同一时期、同一专业场域中进入稳定的论述中心。由此可见,“学者鲁迅”的较早生成,并非单纯的时间先后问题,也不只是对鲁迅既有身份的被动承认,而是日本汉学界依据自身知识结构、研究方法和问题意识,对鲁迅不同身份加以识别、过滤与重组的结果。换言之,何种鲁迅能够较早进入日本汉学界的理解与评价视野,并不完全取决于鲁迅自身身份的多重性,更取决于当时日本汉学界能够接受、处理并转化何种鲁迅。正因如此,《史略》在日本汉学界的早期传播与使用,不仅是一种传播史现象,也揭示了跨文化知识接受过程中具有结构性意义的选择机制。

但是,“学者鲁迅”形象的生成并不能仅仅归因于个别学者的主观取舍,也与日本汉学界的学术倾向与学术氛围有关。鲁迅文学作品中所包含的暴力叙事、审美实验、思想张力以及现代汉语表达的复杂性,往往超出了日本汉学界以训诂、考据和文献整理为核心的方法框架所能从容处理的范围,因而较难被迅速纳入既有的研究体系之中。正如目加田诚之后评价自己的报告《现代中国文学界与鲁迅》时所说:“当时自己并没有理解鲁迅深刻的思想,文章写得并不成熟”(目加田诚,1985:511)。这一自述恰可说明,日本汉学界即使已经注意到鲁迅文学,也未必能够充分把握其思想深度和审美复杂性。相比之下,《史略》所呈现出的断代体例、书目梳理、版本辨析与材料整合等特征,则更符合日本汉学界“可编目、可引用、可整合”的学术需求,因此较早被接纳为可供使用的学术资源。由此形成的,是一种文献吸纳相对超前、文学评价相对滞后的接

受格局:《史略》作为知识型文本较快进入日本汉学界的学术论述,而鲁迅文学作品因其所包含的思想锋芒与审美激进性,则较难在同一时期进入既有学术框架的中心位置。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汉学界对鲁迅的“学术使用”,体现出一种内嵌于现代汉学体制之中的知识选择机制,即面对异质性的文化资源,学术体系往往以既有范式为筛选标准,对其进行选择、过滤与编码。在这一机制作用下,鲁迅被优先塑造为可嵌入学术通史叙述与目录系统之中的“学者”形象,而其文学形象、文本复杂性 with 思想张力,则在制度化的整合过程中被相对弱化。

同时,鲁迅在撰写《史略》时所采取文白相交的书写方式,在客观上也为日本汉学界对其进行选择性吸纳降低了阻力。《史略》在整体结构上固然展现出严谨的学术风格,无论是问题意识的确立、论述层次的安排,还是对中国小说发展脉络的系统梳理,都体现出较强的现代学术自觉。但在具体语言表达上,鲁迅并未完全采用现代白话,而是保留了较多接近传统书写的文体特征,使全书在语感上更接近经由整理与考辨而形成的学术著述,而非通常意义上的现代白话文学文本。对于长期浸润于中国古典文献、习惯以汉文训读方式接触中国知识的日本汉学者而言,这种文体形态无疑降低了阅读与理解的门槛,也更容易使《史略》被纳入既有的汉学阅读经验与学术判断框架之中。也正因如此,《史略》在日本早期传播过程中,首先被把握的往往是其作为学术著作的一面,即材料整理的严密性、体例安排的系统性与文献判断的可靠性。至于其中所包含的作者主体意识、现代思想立场及潜在的文学性因素,则相对不易在同一程度上凸显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史略》的文体特征并不只是表达方式的选择问题,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本汉学界理解鲁迅的路径,使鲁迅更容易首先以“学者鲁迅”的形象进入日本汉学界的视野。

这种以“学术使用优先”的早期路径,其意义并不局限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日本汉学界内部。尽管它并未直接推动“文学家鲁迅”在当时日本的广泛传播,却使鲁迅作为《史略》作者较早获得了可被援引和讨论的学术位置,并为此后日本学界理解鲁迅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知识入口。早期围绕《史略》所形成的学术认可,一方面使鲁迅较早进入日本知识共同体的理解视野,另一方面也表明日本汉学界对鲁迅的接受具有明显的选择性:其学术著作中可供考证、征引和体系化处理的部分,较易被纳入既有研究结构,而其文学创造、现实批判和思想锋芒,则在这一专业场域中并未同步成为稳定的阐释中心。就此而言,“学术使用优先”虽不能概括鲁迅在日早期接受的全过程,却构成了鲁迅日本接受史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基础环节。

5 结 语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鲁迅在日本获得较为明确可见性的路径,与《史略》进入日本汉学研究视野密切相关。通过对仓石武四郎、盐谷温、长泽规矩也、木村毅、目加田诚等学者的相关材料的考察可以发现,《史略》在日本的早期传播,并不只是意味着一部中国小说史著作进入日本,更重要的是,它通过评介、征引、补正、论辩及跨领域转用等多重方式,被纳入日本汉学界具体的研究实践之中。正是在这一持续的学术接受与知识运用过程中,鲁迅逐渐不再仅仅被理解为《史略》的作者,而是被视为能够提供文献依据、文学史判断与学术解释的学者。由此,“学者鲁迅”形象得以逐步确立。

日本汉学界对《史略》的重视,并非“学者鲁迅”形象生成之后的附带结果,而是这一形象得以成立的重要前提。与彼时尚处于零星译介、局部介绍与有限阅读阶段的鲁迅文学作品相比,《史略》更早进入日本汉学界的学术研究脉络,并使鲁迅在日本汉学界获得较为明确的学术认可。由此可见,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日本对鲁迅的早期接受,并非单纯沿着“文学家鲁迅”的路径展开,“学者鲁迅”形象反而呈现出相较于“文学家鲁迅”形象更早获得可见性的特征。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讨论主要集中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日本汉学界对《史略》的学术使用,仍有若干

相关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化。例如:其一,《史略》如何由汉学界逐步扩展至文学界、教育界乃至更广泛的知识场域,仍有待继续追踪,以期更为充分地把握“学者鲁迅”与“文学家鲁迅”两种形象之间的生成机制及互动关系;其二,三十年代以后,随着鲁迅文学作品译介数量的增加及接受语境的变化,“学者鲁迅”与“文学家鲁迅”的相对位置是否发生位移、重叠或重新排序,仍值得进一步讨论;其三,除知识界之外,普通读者、民间读者以及非知识分子对鲁迅的早期接触方式与接受形态,同样应纳入后续考察视野。循此展开,鲁迅在日本早期传播与接受的层次结构,以及“学者鲁迅”形象生成的历史条件与思想意义,或可获得更为细密而完整的阐释。可见,鲁迅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日本的传播与接受,仍值得进一步深入考察探究。

注释

- [1] 目前被研究者发掘的日方史料主要有青木正児《胡適を中心に渦っている文学革命》、丸山昏迷《周作人氏》《周樹人氏》《「面子」与「門錢」》《猪八戒に就いて》《鲁迅氏の創作集〈呐喊〉》、清水安三《周三人》《中国当代新人物》、山上正義《鲁迅を語る》、山口慎一《鲁迅氏の〈阿Q正伝〉に就いて》等。
- [2] 目前被研究者关注的日译鲁迅作品史料有丸山昏迷译《中国小说史略》《大调和》载《故乡》、井上红梅译《阿Q正传》、井东宪译《鸭的喜剧》、镰田政国译《白光》《孔乙己》、神谷衡平译《孔乙己》等。
- [3] 相关研究可参见:藤井省三.日本介绍鲁迅文学活动最早的文字[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2);戈宝权.鲁迅与世界文学[J].中国社会科学,1981(4);丸山升.鲁迅研究在日本[J].纪念与研究,1987(1);松井博光,卢铁澎.中国现代文学在日本——译介综述[J].新文学史料,1991(2);张杰.日本的鲁迅研究(一)[J].鲁迅研究月刊,1991(7);马蹄疾.一九二二年鲁迅交往日人考[J].新文学史料,1996(2);丸山升,靳丛林.日本的鲁迅研究[J].鲁迅研究月刊,2000(11):48-64;沈俊、林敏洁.鲁迅在日本的译介传播[J].文学研究,2017,3(2);藤泽太郎.鲁迅在日本的早期接受情况速写[N].文艺报,2021-10-13(6);冉秀.20世纪20年代日本“鲁迅学”探析[J].鲁迅研究月刊,2021(3);张明杰.鲁迅作品最早的日文译介与传播[J].鲁迅研究月刊,2021(8)等。
- [4] 关于鲁迅文学作品在日本的系统译介与接受格局的形成,既有研究多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视为其明显展开的重要阶段。相较而言,《史略》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即已进入日本汉学界的研究视野,并开始被评介、征引和使用。这一时间差表明,在日本早期接受过程中,鲁迅作为学者获得专业认知的路径,早于后来以文学作品系统译介为基础的“文学家鲁迅”形象的稳定形成。
- [5] 本文所引仓石武四郎关于《中国小说史略》的评介,均见仓石武四郎.中国小说史略[J].支那学,1926,4(1):130-131。除另有说明外,本文所引日文文献均为笔者译文,以下不再另注。
- [6] 经核查是指:宫原民平.支那小説戯曲史概説[M].東京:共立社,1925。宫原民平曾任拓殖大学教授、东京大学讲师。
- [7] 长泽规矩也,东京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科毕业。日本文献学家、汉学家、目录学家。
- [8] 斯文会的前身“斯文学会”创立于1880年,是日本近代最早专注于汉学研究的重要学术团体之一,长期致力于儒学典籍的整理、考订与汉文知识体系的构建,在日本近代汉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1919年,该会创办《斯文》,至今仍为其学术成果的集中展示平台。
- [9] 自1926年起,《斯文》多次刊载与鲁迅相关的动态与文章:同年8月的“东亚学术思想界”栏目中,提及即将出版的鲁迅著作《小说旧闻钞》以及鲁迅作题记的《何典》;10月刊推介台静农编选的《关于鲁迅及其著作》;1927年3月刊转载鲁迅所撰《关于〈三藏取经记〉》等;同年5月报道鲁迅翻译了京都大学教授铃木虎雄的文章《运用口语的填词》。
- [10] 指李渔著作《肉蒲团》。
- [11] 本节所引木村毅的内容,均见木村毅.明治文学展望[M].東京:改造社,1928。后文不再另注。木村毅,早稻田大学英文系毕业。日本文学评论家、明治文化史研究者、小说家。
- [12] 本节所引土田杏村的内容,均见土田杏村.文学の発生[M].東京:第一書房,1928。后文不再另注。土田杏村,京都大学哲学系毕业,日本哲学家、评论家。
- [13] 目加田诚,东京大学文学部毕业,日本中国文学研究者。

参考文献

- 冉秀.20世纪20年代日本“鲁迅学”探析[J].鲁迅研究月刊,2021(3).
- 乐融.清水安三为何推崇鲁迅[J].上海鲁迅研究,2014(1).
-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鲁迅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鲁迅.关于《三藏取经记》等[M]//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土田杏村.文学の発生[M].東京:第一書房,1928.

- 木村毅. 明治文学展望[M]. 東京: 改造社, 1928.
- 内田泉之助. 長恨歌の展開[C]// 広島高等師範学校国漢文学会, 編. 国漢文研究叢書: 第2輯(支那の礼と歌詞の研究). 京都: 星野書店, 1927.
- 目加田誠. 目加田誠著作集: 第4卷(中国文学論考)[M]. 東京: 龍溪書舎, 1985.
- 目加田誠. 現代中国文学界と魯迅[J]. 斯文, 11(3).
- 米田祐太郎. 支那近代小説考[J]. 東洋, 30(11).
- 長澤規矩也. 傳奇四十種と小説三十種[J]. 斯文, 8(7).
- 荒野悌三郎. 『覚後禅』の翻訳に就て[J]. 文芸春秋, 2(11).
- 鈴木将久. 魯迅『狂人日記』日本語訳史考: 井上紅梅の場合[J]. アジア評論, 2020(2).
- 倉石武四郎. 中国小説史略[J]. 支那学, 4(1).
- 倉石武四郎. 「目連變文」紹介の後に[J]. 支那学, 1926, 4(3).
- 倉石武四郎. 日本で掘り出せる支那小説の話[J]. 書物礼讃, 1926, 4.
- 徳富蘇峰. 魯迅氏の中国小説史略[N]. 國民新聞, 1926-11-14(2).
- 増田涉. 訳者の言葉[C]// 魯迅. 支那小説史. 増田涉. 訳. 東京: サイレン社, 1935.
- 藤澤太郎. ある魯迅翻訳者の生涯——日本最初期の魯迅翻訳者鎌田政国について[C]// 『越境する中国文学』編集委員会, 編. 越境する中国文学: 新たな冒険を求めて. 東京: 東方書店, 2018.
- 鹽谷温. 明の小説『三言』に就て(二)[J]. 斯文, 8(6).

The Formation of Lu Xun as a Scholar: The Academic Use of *A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Fiction* in Japanese Sinological Circles

CUI Zixian

(Seinan Gakuin University)

Abstract: Existing studies on the dissemination and reception of Lu Xun in Japan have primarily focused on the translation of his fiction, literary evaluation, and the reception of his thought. Relatively little attention, however, has been paid to how his scholarly works entered the knowledge-production process of Japanese Sinological scholarship. Focusing on the academic use of Lu Xun's *A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Fiction* (*Zhongguo xiaoshuo shilüe*) in Japanese Sinological circles during the 1920s, this article examines early reviews, specific citations, and the work's actual uses across different fields of research. It analyzes how *A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Fiction* was gradually transformed from a reference work into an academic resource capable of supporting scholarly judgment. On this basis,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compared with the image of "Lu Xun as a literary writer," which at the time was still shaped largely through sporadic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the image of "Lu Xun as a scholar" gained clearer visibility earlier within Japanese Sinology. This article further argues that Japanese Sinologists such as Kuraishi Takeshirō and Shionoya On incorporated *A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Fiction* into concrete research practices concerning the history of fiction, bibliography, edition studies, terminological analysis, and cross-cultural literary discourse through reviews, citations, and critical corrections. In this process, the work gradually became an important scholarly basis for bibliographical identification, judgments on editions, and literary evaluation. At the same time, Lu Xun came to be recognized not merely as the author of *A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Fiction*, but as a scholar capable of providing documentary evidence, scholarly judgment, and interpretive frameworks. Lu Xun's early image in Japan was therefore not shaped solely through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it was also generated through textual use, knowledge classification, and scholarly evaluation within Japanese Sinological scholarship. This reception pathway, characterized by the priority of academic use, not only reveals the mechanism of knowledge selection through which Japanese Sinology approached Lu Xun, but also offers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formation of Lu Xun's image in cross-cultural transmission.

Keywords: Lu Xun; scholarly image; *A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Fiction*; Japanese Sinology; knowledge-selection mechanism; cross-cultural transmission

(责任编辑: 王晨萌)